

殊途同归：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比较*

——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

孙文中¹

摘要：以 30 名农民工的务工经商生活史的深度访谈资料为基础，从生命历程视角关照了新老两代农民工自外出务工、城城（乡）流动到选择归宿的生命轨迹。在社会结构及机会结构下，农民工社会融入是依循着年龄层级在一系列生命事件中依社会角色变化而进行反思性自我定位的行动过程。研究表明，两代农民工具有相似的生命轨迹，家庭角色的转变型塑了他们最终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由于新老两代农民工禀赋差异和代际特征，新生代农民工虽具有更多城市性和现代性，其融入意愿也发生了代际转变，但因面对的机会结构限制和自身能力不足，其社会融入仍具有代际传承性，实质是区隔性融入。

关键词：生命历程；农民工；社会融入；代际转变；代际传承；区隔融入

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产生了社会结构下的利益关系调整、文化冲突、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等问题，其实质是由工业化、城市化引发的人口迁移带来的社会融合问题造成的。当前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农民工群体中大多数人仍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而是一个往返于城城之间、城乡之间的“候鸟式”群体。针对这个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①在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方面具有一定的成效，但现实是大部分农民工仍处于“半城市化”状态。2013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 2.69 亿人，随着农民工数量不断增长，其群体内部出现了代际分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由于出身年代和生活经历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存在明显代际差异，他们对城市生活更加向往，定居城市的愿望更加强烈。受结构机会和制度因素等影响，两代农民工同样在城市遭遇诸多困难，陷入了社会认同丧失和重构的双重困境，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代际传承特征和底层社会的阶级再生产凸显。事实上，农民工在由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过程中，其群体的社会融入已嵌入到社会宏观结构和家庭生命轨迹中，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随着年龄层级和家庭角色变化而动态发展过程，只有回归到农民工具体的实际生活体验中，通过比较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异同点，分析农民工代际间的发展走向，才能真正揭示问题的本质。本文从生命历程角度，分析两代农民工面临的机会结构、重大生命事件等内容，以及个体生命轨迹的转变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相似及相异之处？进而探讨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最终结果是否殊途同归？国家应如何通过政策调整来引导农民工社会融入，进而促进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或回归农村？

一、文献回顾

（一）国外移民的社会融入

伴随着工业化、全球化过程中移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及相关社会问题的凸显，西方学者尤其关注移民社会融入问题，形成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关于移民社会融入的概念内涵存在着多重界定，如同化、社会适应、社会融合等等；社会融入的维度包含经济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政治性融入和主观认同等维度；在移民融入的归因解释上，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政策制度的解释范式提供了三种最主要的解释框架^[1]。关于社会融入有三种研究范式，一是 Warner 和 Srole 提出了“直线型”融入，认为移民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随着时间的

[收稿日期]2014-11-10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转型视角下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 JA13182S）

[作者简介]孙文中，集美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博士生，邮编：361021。

^①国家出台的政策包括 2006 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 号），2009 年一号文件要求放宽中小城市的户籍限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2012 年《民政部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等。

推移, 其行为与本地原住民会越来越相似^[2]; 二是 Gans 提出了“曲线型”融入, 认为移民未必能够在新社会环境中实现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改善, 第二代移民也可能被主流社会边缘化, 无法真正融入新的社会环境^[3]; 三是 Portes 和 Zou 通过对美国第二代移民的研究, 提出了“区隔型”融入, 旨在解释新移民或者第二代移民与先辈融入模式有很大的差异, 移民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有多种不同的方式, 既可能按照传统的直线型模式融入主流社会, 也可能被迫陷入底层社会中^[4]。当前我国大规模的农民工也面临着和西方国家移民类似的社会融入问题, 区隔型融入理论比较适用于我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研究。

(二) 我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不仅是一个地域变迁和人口转移问题, 更是一个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维度以现代性为参照系、逐渐向城市范式变换的过程, 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排斥和制度结构等。社会融入是指特殊情境下的社会群体, 融入主流社会关系网当中, 能够获取正常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动态过程或状态^[5]。朱力认为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有三个依次递进的适应层次, 分别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 当前农民工的适应状况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 政策性与制度性因素阻碍了农民工适应的深入^[6]。杨菊华认为流动人口的融入轨迹和模式因次人群而异, 经济整合通常发生在先, 次为文化接纳, 再次为行为适应, 最后是身份认同^[7]。张文宏、雷开春基于 2007 年上海城市新移民调查, 分析发现移民社会融合程度总体偏低, 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较高, 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较低^[8]。

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主流观点不同, 回流作为一种体制性现象伴随着农民工流动的始终, 是农民工根据自身需求, 依照自己的生存逻辑而进行的主体性选择。农民工的回流与年龄因素、老人赡养、农业负担较重、与家人团聚等因素以及输出地经济的发展程度有关^[9]。随着时代的演进, 新生代农民工也出现了回流, 他们似乎仍在重复父辈的人生轨迹。回流的农民工面临着返乡后的农村社会适应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更难融入农村的生活。

(三) 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比较

学者已注意到农民工群体内部开始出现分化, 认为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程度、融入能力以及时代特征方面存在鲜明差异, 但是关于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程度方面, 学界见仁见智、分歧很大, 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新生代城市融入程度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刘传江、程建林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46.21%) 和市民化水平 (50.23%) 分别比老一代农民工高 28.12% 和 18.93%^[10], 何军基于江苏省农民工的调查, 认为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高于第一代农民工^[11]; 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比老一代农民工低, 景晓芬利用重庆和珠三角地区调查数据,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更低^[12], 魏万青基于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面临着更高的融入门槛, 在社会融合上处于不利地位^[13]; 三是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差异不大, 李培林认为大多数研究者样本分布在少数地区或者单一城市, 缺乏全国范围的调查样本, 造成结果存在差异, 因而依据 2011 年中国社会状况进行调查, 发现两代农民工之间并没有根本差异, 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 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14]。

目前, 关于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比较侧重定量研究, 而代际差异的定量研究结果常常是相互矛盾的。派利等认为在代际差异研究中使用横向研究方法是导致研究结论相互矛盾的主要原因, 横向设计在同一个时点对代群进行抽样调查以比较不同代群之间差异, 排除了影

响最小的时代效应，但对价值观影响较大的年龄效应依然夹杂在代际差异结果中，其有效性上容易受到质疑^[15]。质言之，上述研究忽视了农民工社会融入主体性的动态变化，一方面，农民工拥有的资源禀赋与技能素质不尽相同，他们对自身禀赋状况的认知也会影响其融入意愿。另一方面，农民工经历结婚生子、子女教育和赡养父母等重大生活事件，以及所处的年龄阶段及家庭角色会影响他们定居城市和返乡回流的抉择。

对于农民工而言，社会融入包括城市和农村社会的适应、融入的双向过程，两者此消彼长。目前关于两代农民工的代际比较往往是静态的、阶段性的，而事实上农民工社会融入是一个随着生命历程而逐渐展开的动态的、变化的过程，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诉求和状况会随着他们在城市生活时间的增加和生命周期的阶段而不断变化。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以生命轨迹、转折点和时机等概念为核心，强调纵贯性的研究范式，提供了超越静态分析的有效途径，为分析农民工社会融入提供了新的解释力。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视角

生命历程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级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16]。生命历程理论将个体的发展轨迹与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阐述人类生活，体现在以下四个原则：一是生命的时空性原则，认为个人的生命历程植根于和受限于历史时间和地方背景；二是生活的时序性原则，认为人生是由转变、转折点、持续组成的连续轨迹，强调了生活转折或者事件对于个人的影响程度以及与时间的关系；三是相互联系的生命原则，认为社会和历史通过网络对个人产生影响；四是能动性原则，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在历史和社会环境提供的机会和制约下通过选择和行动来构建其生命历程。因此，生命历程研究范式要求必须在多重时间维度内来研究个人生活，尤其要关注年龄效应、同龄群体效应、历史环境和年龄级变迁的效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关注整个生命历程中年龄的社会意义；第二，研究社会模式的代际传递；第三，宏观事件和结构特征对个人生活史的影响^[17]。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该范式的关注日益增多，涌现一些经典性的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但该范式尚未用于分析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因此，从生命历程视角比较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异同点，展现其融入情况的代际传承与代际转变，分析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世代效应，可以纵贯地剖析出生于不同年代的农民工，是如何受到时代特征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影响其融入轨迹的社会、历史和个体因素有哪些？以期能够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得出全面认识。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生活史的研究方法。生活史被定义为一种着力于再现个体一生或者某一阶段生活经历以及这种生活经历所反映出来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个人、组织以及社会主题的研究方法^[18]。生活史研究法认为，通过个体生活的再现可以加深对生活经历的价值理解以及对与此相关的更宏大的社会主题的解读。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生活史是个体行动者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历史力量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规制，农民工对自身务工的回忆，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下的主体建构，采用生活史的研究方法其优点在于揭示农民工城市生活经历的历时性、复杂性和多层性，从其“实践”主体出发，还原两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感知、体验和适应等具体性问题的真实。否则，抛开农民工的生活轨迹来谈其城市融入的问题，则很难获得其解释效度。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收集资料，从2014年3月至10月，在闽南J工业

区霞梧、东山、凤林等城中村选择 30 名两代农民工进行访谈，其中新老世代农民工各 15 名，每个对象的访谈时间约 2-3 小时。J 区主要以服装、电子、石材加工为主，访谈对象主要来自 F 省内其他县市的农村，省外主要来自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地，主要从事建筑、电子加工、服装加工和餐饮服务等行业。本文从农民工对打工生活回忆中，勾勒出农民工“外出务工-城乡流动-选择归宿”的生命轨迹，在历时态的时空背景下对农民工生活史进行过程分析，具体考察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入情况、生活期望及社会归属等实践逻辑，以期对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做出新的解释。

三、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生活史

本文从 30 例深度访谈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 6 例剖析农民工生活史，通过农民工回忆自身的务工目的、工资收入、社会交往、身份认同和留城意愿等内容，结合对农民工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结构、制度因素和历史事件，将农民工的外出务工的生命史与家庭周期、年龄层级结合起来，进而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来把握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异同点。

（一）老一代农民工“叶落归根”

老一代农民工对农村有较高的认同，他们外出务工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对城市生活的心理距离和认同度较低，融入意愿较少，年老后渴望叶落归根。

“我 32 岁时外出打工，挣钱主要用来供子女读书和盖房，家里还种着地，农闲的时候我就出来找活干，本来打算年纪大了就回去继续种田。但最近儿子结婚买房需要钱，我就到这家建筑工地打零工，吃住都在工地上，和工友也很熟。我老婆在一家小餐馆洗碗，月收入 1800 元，她不会讲普通话，很想回老家。我们这个岁数还在打工，就是为了赚钱，不然谁愿意在外受这份苦，人总要叶落归根的。”（SJZ，男，1964 年出生，小学文化，已婚，一子一女，来自福建龙岩，建筑工地工人）

“初中下学后，干了两年农活，听村里人说打工能赚钱，我就出来闯闯。刚来时，在餐厅做帮手，业余时间我经常专研厨艺，考上了中级厨师证。1999 年结婚，有了孩子后，妻子在家带孩子。2003 年我们承包了一家干洗店，由妻子经营，生意逐渐有了起色，我也成为餐厅经理。2007 年房价没现在高，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就贷款买了房，接孩子来读书。虽然在这定居了，但总感觉与城里人有些差距。今年在老家盖了楼房，打算年老后回家养老，赡养父母，城里房子留给孩子。”（HPY，男，1976 年出生，初中文化，已婚，一子，安徽肥西人，JM 大学 C 学院餐厅经理）

“我丈夫 35 岁时外出打零工，我一直在家里边干农活边照顾两个儿子上学。2009 年经济形势不好，丈夫回家，利用打工的积蓄在老家建了楼房。2012 年，大儿子在外地打工，小儿子读大学，考虑到儿子结婚、读书需要钱，我和丈夫出来打工，家里的地交给老人种。目前，我在 J 区服装厂上班，丈夫在建筑工地打工，现在年龄大了，活又多又累，感觉身体吃不消了，打算再干几年多赚点钱就回老家。”（KNM，女，1970 年出生，小学文化，已婚，两子，湖北鄂州人，服装加工厂工人）

老一代农民工在乡村经历了完整的社会化过程，结婚生子后才离开农村，目前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生命阶段。外出打工是老一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的主要转折点，务工目的在于满足家庭的基本开支，服从一种“家本位”的打工模式，正是在这种家庭责任下，他们节衣缩食、忍受劳累的工作，所挣到的钱也以汇款或者积蓄的形式寄回老家。据《2013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老一代农民工初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为 35.9 岁，29.5% 的人从事建筑业，26.5% 从事制造业，人均寄回/带回老家的现金为 16291 元。正是这种务工的逻辑极大地影响了其在城市的社会融入，部分在城市已经取得一定经济成就和积累了社会资本的老一代农民工仍然打算返乡。大多数老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意义是旨向农村的，既往的生活经历和家

庭角色期待锁定了他们打工时的生活期望和社会身份认同。随着个体生命的演进,身体机能的老化、家庭阶段任务的完成,他们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之后,返乡成为常态^[19]。

(二) 新生代农民工“落地未生根”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存在不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他们对城市有较高的认同,对农村认同逐渐淡化^[20]。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但是他们很难跨越外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这也许就是他们虽然进了城,但并没有在城市“生根”的原因所在^[21]。

“2009年中专毕业后,我就这里找工作,虽然学的酒店管理,但是也只进了一家四星酒店当服务员。听说现在大学生都不好找工作,更何况中专呢?干了两年就辞职了,现在我自学会计,以后想做财务工作。我希望能在这边成家,毕竟同学和朋友圈都在这里。”(CYX,女,1992年生,中专毕业,未婚,江西九江人,酒店服务员)

“村里年轻人都在打工,我高二没念完就出来了。先在厦门TDK上班,月收入2000元,同事都是外地人,只干了一年,流水线工作太累太枯燥。辞职后,去广州一家美容公司干了2年,没攒到钱。2009年,被父母催着回家相亲,半年后结婚了。在农村呆了两年,很无聊,有了孩子后开支增大,我和老公又来厦门打工,孩子留在家里给老人带。大城市虽好,但没有本地户口、消费高、压力大,暂时没有长远打算。以后回老家县城买房,不愿回到农村。”

(ZJ,女,1984年生,初中文化,已婚,一女,准备要第2个孩子,河南漯河人,服装厂工人)

“1999年我因8分之差没考上大学,家里没钱复读,我就回家当代课教师,30岁时经人撮合就和以前的同事结婚了,之后我们去东莞打工。老婆怀孕后,回老家了,有了孩子她在家带孩子,我出来打工。孩子3岁时,我租了房,接女儿在这里上学。目前,我和我爱人都在电子厂上班,要经常加班,没有娱乐时间。我觉得我既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里人,不打算回农村,反正尽量会呆在大城市里,平时只有过年、过节才回老家。”(SB,男,1981年生,高中毕业,已婚,湖北襄阳人,电子厂技术工)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改革开放后,成长于一个农村年轻人务工成常态的时空环境,升学无望的制度化途径受阻后,打工成为他们“公共的生命历程”,更是家庭及社会给他们规定的生活模式。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仅为21.7岁,87.3%的新生代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劳动,更偏好在东部地区及大中城市务工。耳濡目染的城市文化解构着他们的乡土认同,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也使得他们不再适应农村。初次外出务工时大多没有成家,打工成为他们人生历练的必经阶段,也预示着一种城市化的生活机会,但是当其逐渐步入结婚生子的年龄后,个人承担的家庭角色影响了其生活预期,严峻的现实是他们缺乏在城市购房的经济能力或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受时空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制约,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体验的积淀效应使其对城市的归属感产生了不利影响,成为农村与城市双重边缘化的群体。宏观社会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房价高涨,使得新生代融入大中城市社会的机遇变得越来越小。

四、解释框架的初步检验: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比较

(一) 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传承

总体来说,两代农民工有着相似的生命历程、受生活重大事件的影响,其城市融入程度都较低,处于“半城市化”融入状态,社会融入存在代际传承性。

1.代际传承性:共同的生命历程和“半城市化”。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一个随着其生命历程逐渐展开的持续过程,大致经历初次进城→频繁流动或趋于平稳→选择归宿三个阶段。农

民工初次进城后，往往面临着城乡生活方式差异，社会网络断裂等问题，经历着频繁的工作变动。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普遍面临“短工化”的趋势，具有水平流动特征，频繁换岗后其薪酬、技能和管理层级均无实质性提升。除了长期重复劳动产生的厌倦感外，他们试图通过换工作找到理想岗位，“初次进城后，语言、习俗都不适应，生活很辛苦，换了很多工作”（ZJ 访谈）。随着个体生命时间推进，承担家庭责任需要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有保障的收入，他们逐渐进入职业平稳阶段，与人生阶段的角色和任务相嵌套，生命历程中经历的如盖房/买房、结婚生子、子女上学、赡养老人等重大事件，对其选择城市/农村作为最终归属有重大影响。目前，只有极少数农民工能够在城市扎根，大多数农民工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年龄累积劣势凸显，其最后归属是返乡回流。

当前，我国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并没有融入到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中，而是处在“半城市化”状态，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22]。从制度层面来看，两代农民工遭受城市社会的制度排斥，难以享受平等的市民权利；从就业情况来看，农民工主要在次级劳动市场就业，所从事的大多是收入低、不稳定、无保障的低层次工作；从社会生活来看，大多数农民工没有能力租住或购买体面的住房，导致居住的边缘化和生活的“孤岛化”。从社会认同来看，两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没有归属感，或者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可。可见，农民工在经济收入、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心理归属都出现了“半城市化”状态，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具有代际传承性。

2. 影响因素：社会结构和家庭角色。生命历程的时空性原理认为个体的生活轨迹与其所经历的社会历史时期与地域空间有关。农民工的生命历程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和家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共同构筑的。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制度因素如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等都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此外，农民工的生活轨迹受制于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如 2009 年金融危机后农民工出现了返乡潮，当经济形势转好后，农民工又继续外出。如新生代 ZJ 受金融危机和结婚生子的影响，返乡呆了两年。

生命历程相互联系的原理认为，个体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中，不仅表现为横向的人际关系网络，同时表现为纵向的历史文化承接。两代农民工都服从“家本位”的打工模式，外出务工是嵌入在家庭角色使命之中的，受制于生命历程中时间性的规制，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随着生命周期的展开而发生着改变，外出打工仍然与家乡、家人、家庭责任紧密相连，个人生活受到传统观念和生活习俗的影响。不同生活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家庭对个人的角色期待的变化标志着人生轨迹的重要转变。“老婆怀孕后就回老家，孩子出生后为了养家糊口就又到城里打工。”（SB 访谈）。此外，对农民工来说，规制性的社会结构无法改变，他们的选择空间非常狭窄，导致其融入城市的道路异常艰辛。正是规制性的社会结构加上社会性生命发展历程的共同作用，使得他们的人生轨迹具有共性特性，是劣势资源的传递与继承，这也造成了农民工底层社会的阶级再生产。

（二）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转变

从生命历程角度来看，在经受巨大变迁的社会中，出生在不同年代的人，个体所拥有的社会机会和个体所受到的社会限制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差异的主要原因。

1. 代际转变：心理归属和身份认同。生命历程尤其强调社会性时间，即角色的发生、延续、后果以及相关的年龄期望和信念。老一代农民工将务工作为一种兼业活动，他们在农村经历了完整的社会化过程，心理归属指向农村，往往将自身定位为“城市的外乡人”。“身体吃不消了就回老家，早晚得落叶归根。”（SJZ 访谈）。老一代的生活“嵌入”于乡村的

社会情境，一方面，农村生活和城市工作的叠加帮助其获得收入维持农村社会的运转，并提供了劳动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农村的人际关系、劳作习惯以及身份认同使得其能够在重重压力下的城市劳动现场找到生存的空间^[23]。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劳动力市场的排斥，大部分老一代农民工回到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赡养父母，重构地缘、亲缘关系网络，这种以农村为生活意义的务工逻辑极大地影响了其城市融入。

而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改革开放后，大多数人出了校门就进入了城市，具备了城市性和现代性特征，对城市有较高的认同，渴望在城市定居。但是，宏观形势并未朝着有利于新生代的方向发展，城市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和生活空间并没有太大改善，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非农发展取向，但他们也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出现了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和无法融入城市的焦虑失落感，处于“进则不能，退又不甘”的两难状态，脱嵌于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成为双重边缘人，甚至也不认同自己农民工的身份，“打工也不能让我过上城里人生活，但是我早就不习惯农村了”。（SB 访谈）。

2.影响因素：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从生命历程角度来看，农民工对城市融入的诉求与个人在人生阶段的角色和任务相互嵌套，个体年龄层级的演进带来个体在成熟度、职业阶段和家庭角色上的变化，经历的重大生命如职业选择、结婚生育和赡养父母等关键性生命事件型塑了其社会融入意愿。老一代农民工初次外出时已经完成社会化，这使得他们的劳动技能与意义归属都扎根于乡土，农村务农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会对其整个生命历程有着重要影响，当其外出务工的人生任务完成后，年龄累积劣势凸显，多数人融入城市的需求和融入意愿逐渐减少，这也与村庄对其返乡的心理期待吻合；而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强融入城市的意愿，但其融入城市的能力与社会结构存在张力，处于紧张状态。生命历程“个人能动性”认为，人总是在一定社会建制之中有计划、有选择地推进自己的生命历程，即使在有约束的环境下，个体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行为。老一代农民工 HPY 因个人能力、历史机遇等原因，实现了买房定居城市的梦想，但是具有恋乡情结，仍打算年老后仍然返乡。职业拐点是影响农民工生命轨迹的机遇，是一个积累技术和经验的过程，需要在长远的毕生发展规划中来完成。新生代农民工 ZJ 频繁跳槽、没有随年龄增长而积累专业技能，在就业中处于弱势地位，极大地限制了其城市融入。

（三）区隔融入：相异却又相似的结局

通过比较，农民工无论是在就业、住房等结构性融入方面，还是在公民权利、社会参与、思想观念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距，形成了与主体社会的区隔，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种区隔融入。区隔融入源于行动者自身的局限、流入地的结构性制约、流入地居民有意或无意的偏见与歧视、宏观的制度与体制束缚了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主流社会^[24]。从生命历程角度来看，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代际转变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一代农民工不能胜任城市里的繁重工作而逐渐回到农村。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是甘愿选择了放弃城市生活的话，那么新生代由于发展取向与机会结构存在很大的张力，是在一系列社会结构因素和经济压力下的被动放弃融入城市的过程。新生代在生活方式上与城市趋同，有着工人的心态，较低收入与较高的消费是这“代”年轻人共同特征，他们对城市有着更多的眷念，倾向于留居城市，他们有着不确定的未来，甚至面临返乡生活的适应性问题。随着生命历程的演进，两代农民工承担家庭责任的使命是他们外出的基本动力，生命历程越处于成熟阶段，现实生活压力（工作不稳定、收入低、家庭不能团聚等）和结构制度性因素（无城市户口、无法享受公共服务等）越来越阻碍其融入城市，延续着农民工的生命轨迹。当外部生活重大事件发

生时，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往返，尤其是生命周期进入抚养或赡养阶段时，他们不得不返乡以尽家庭责任。两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生命历程具有代际传承性，他们的人生选择具有共性，也是家庭生命周期的使然。

五、未尽的话题：殊途同归？

审视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生命历程，有助于揭示两代农民工未来的发展走向和最终归属。个体受到“一定生活时间”和关键生命事件发生的影响，社会时空结构性因素以个体生活体验的积淀效应对农民工的社会归属感产生影响。两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具有相似性，农民工个体依循着年龄的层级演进，对其外出务工经商行动不断进行反思性定位与调适，选择合适自身的社会融入模式。从生命历程的视角看，具有人生节点意义的生命事件发生会使农民工的生活预期发生转变。随着不同阶段家庭责任的到来，他们也调整着自己的心理预期和未来打算，或最终定居城市或返回农村。当前只有少数农民工能够把握机会，突破城乡二元结构，融入城市社会，更多的农民工只能成为城市的“过客”，最终返乡回流。

从生命历程角度看，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代际传承与代际转变并存的特点，其实质是一种区隔性融入。老一代农民工的返乡回流、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正好实现了城市劳动力的更替。从现实来看，大城市不可能无限制地吸收进城农民工，其环境承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除了认识到两代农民工对于城市融入的区别性诉求之外，也要考虑如何才能让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可进可退。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四化建设”和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合理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返乡适应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因此，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返乡回流问题与推进城镇化有机结合，这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否则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甘肃行政学院院报, 2010(2):18-27
- [2] Warner,W.L. And L.Srole.The Social Systems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5
- [3] Gans,H.Symbolic Ethnicity:The Future of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es in Americ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1979,2(1):1-20
- [4] Portes,A. And M.zou,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among Post-1965 Immigrant Youth.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st-1965 Immigrant Youth,1993 (530):74-96
- [5] 张广济. 生活方式与设计融入关系的社会学解读.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2(3):42-44
- [6] 朱力.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 2002(6):82-88
- [7] 杨菊华.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 2009(1):17-27
- [8] 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 2008(5):117-141
- [9] 胡枫、史宇鹏. 农民工回流的选择性与非农就业：来自湖北的证据.人口学刊, 2013(2):71-80
- [10] 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人口研究,2008(5):48-57
- [11] 何军.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农业经济问题, 2012(1):52-59

- [12] 景晓芬.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适应——基于重庆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南方人口, 2012(3): 65-72
- [13] 魏万青.禀赋特征与机会结构——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代际差异分析.中国农村观察, 2012(1):13-21
- [14] 李培林、田丰.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 2012(5):1-24
- [15] Parry, E., & Urwin, P.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value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vid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1,13 (1):79 – 96
- [16] Elder, G. H. et al: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Course Theory*, Mortimer, J. T. &A. Michael J. (eds.),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NewYork: Springer: 2003
- [17] 李强、邓建伟、晓箏.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 1999(6):1-18
- [18] Goodson. *Studying teacher's lives*. London: Routledge, 1992
- [19] 张世勇.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返乡农民工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 2011
- [20] 王春光.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青年探索, 2010(3):5-15
- [21] 许传新. “落地未生根”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 南方人口,2007(4):52-59
- [22] 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06(5):107-122
- [23] 黄斌欢. 双重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形成. 社会学研究, 2014(2):170-188
- [24] 杨菊华.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 2009(1):17-27

Reach the Same Goal by Different Means: The Comparison of 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

Sun Wenzh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0 migrant workers whose life history in urban society, , conducted an analysis on the migrant workers' life trajectory from leaving their home for the first time ,job hopping from city (rural area)to city ,to selecting the dest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This paper argued that constraint to social structure and opportunity structure,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could have be a reflective action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ir age-grade in a series of life events accompanying the adjustment of their roles in their families.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y have the same life trajectory, their adjustment to their roles in their families shaped their ultimate life expectation and social attribution. Because of different endowment and inter-gen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wo migrant workers,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have more urbanity and modernity, their will of 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also changed across generations, however, due to opportunity structure restrictions and their low ability,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still has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the essence is segmented cohesion.

Keywords: life course; migrant worker; integration into societ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ition;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segmented cohesion